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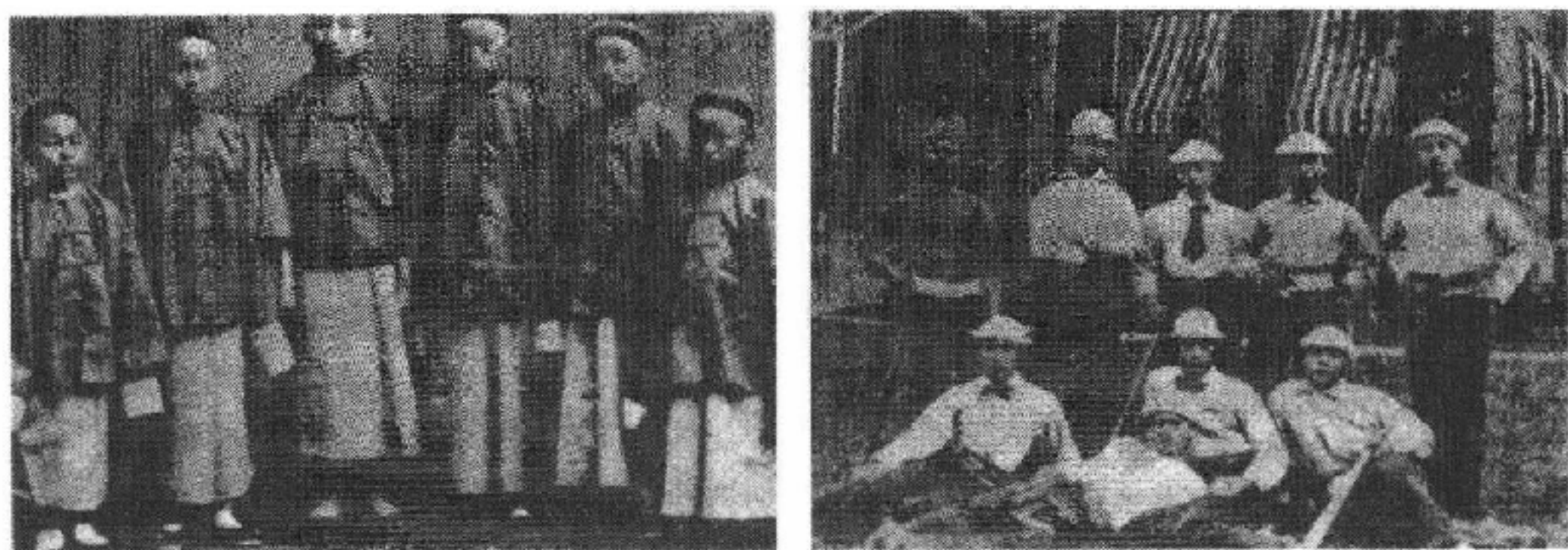
中国早在唐代就已出现了登载朝廷文告的“邸报”，但它并非正式出版物，而且形式单一，一般京师的商家印发这些所谓的报纸有偿向全国的士大夫通报朝廷的动向与文告。在城市里，坊间亦印刷一些附带新闻的商业广告，由小贩沿街兜售。另外，行会规定的价目表及官府镌刻的书籍目录，也是当时传播新闻的一个途径。

真正将新闻报纸带入中国的是新教传教士。新教传教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未能打入中国内地，于是他们印行用中国方言翻译出的福音书进行传教。伦敦布道会于1815年在马六甲开设了一家报馆并发行一种中文月刊。其他传教机构亦纷纷效仿，除去中文期刊外，当时还创办了China Mail（1845年创于香港）、《北华捷报》（又名《先锋报》，1850年创于上海）等报纸。这些报纸主要登载时事新闻、商业动态及领事公报，它们便是中国现代报纸的先驱。

后来不少文人也纷纷投身报界评论时事，中国的报纸遂超越了提供事实的幼稚期。清政府对此十分忌憚，因此该类报纸也只有在通商口岸才可容身。这批报人的先驱王韬，其人本为封建知识分子，19世纪50年代曾在上海任职于伦敦布道会所办的墨海书馆，60年代又协助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儒家的五经，其中有两年是在苏格兰度过的。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以评论时政为主，并时常穿插他游历欧、日的随笔。王韬对清政府常常提出批评，但他在内心深处却是一名爱国主义者，而王氏的爱国思想与改良思想正是来自于他早年与西方的接触。

派遣海外留学生

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对洋务运动产生了更大的推动作用。最早留学国外者当推容闳，他出身广东香山一贫苦农家，幼时入澳门马礼逊学堂学习英文，后被传教士送往美国学习。他在美国皈依了基督教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说，通过在耶鲁的学习，他感到了“无知者永远体会不到的责任感”。他认为，“向西方学习，也许会使中国



中国的首批“留学生”。

左图：1872年到达旧金山时摄；右图：中国学生棒球队“东方”队，摄于1878年。这批学生于1881年被召回中国。

获得新生，变得文明而强大”。但直到1872年，容闳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下，得以实现他盼望已久的梦想——中国向美国派遣教育考察团。通过这项计划，120名身着长袍马褂的中国男孩（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农家）分为四等被送到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首府哈特福德（Hartford）学习。他们在当地人家住宿，同时定期到考察团总部学习儒家经典。很快他们在语言和服饰上经历了一场“缓慢而明显的转变”，他们把辫子盘了起来，日益变得活泼好动，精力旺盛，即变得“美国化”了。此时容闳已与一名美国女子结婚，在气质上他更像一名基督徒而非儒教徒。他对这一文化同化现象也持赞成态度，这令思想保守的同事大为震惊，将这一动态反馈给了清政府。由于考察团耗资巨大，加之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又兴起反华浪潮，这场留学运动便中途夭折了。当这些学生返回上海向道台叩头请安时，他们却因对传统科举制度造成冲击而受到八股学者的猜忌。因此，容闳的这批学生主要只是从技术、管理、海军、电报及铁路、外交、开矿等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某些作用，而其中只有12人后来步入了仕途。

新教传教团与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新教传教团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同样也是大力耕耘而收获甚微，充满了挫折与失败的经验。1870年时在华天主教传教士有250人，1896年达到